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解放日报改版与延安整风

杨放之

艰苦的岁月 战斗的历程

戴 邦 杨居人

梅园新村三小时

王孚庆

《粤港行脚》的采写回忆

傅白芦

新闻摄影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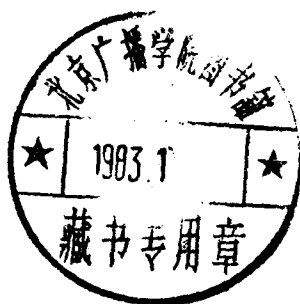
新闻摄影研究室

新闻 研究 资料

新闻研究资料

第十八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三月

新 闻 研 究 资 料
第 十 八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80,000字
1983年3月第一版 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7190·010 定价: 0.80元

目 录

关于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改版与延安整风·····	杨放之 (1)
陆定一同志教我们写社论·····	黄 钢 (6)
延安记者生活片断·····	洪 流 (13)

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 (征求意见稿)

·····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	(18)
--------------------	--------

回忆录

艰苦的岁月 战斗的历程

——回忆雪枫报·····	戴 邦 杨居人 (48)
大众报纪事·····	陈志昂 (74)
南京人报反击龚德柏之战·····	拾 风 (92)

印象深刻的一次采访

梅园新村三小时·····	王孚庆 (100)
《粤港行脚》的采写回忆·····	傅白芦 (107)
一篇现场目击记的产生·····	王士谷 (124)
访问李济深·····	刘乐扬 (127)
一次失败的采访·····	刘迪明 (131)

高文华、贾璉夫妇为党卖儿的采访……………张 沪 (136)

新闻摄影史料

根据地的第一本新闻摄影画报

……………新闻研究所新闻摄影研究室 (141)

根据地画报宣传一览

……………新闻研究所新闻摄影研究室 (153)

报刊史料及研究

读周钦岳同志文章的意见……………韦 孚 陈理源 (165)

《读书生活》奋斗的两年……………闵大洪 (178)

胡适与《独立评论》……………赵海啸 (186)

四川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何承朴 (208)

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十)

……………方汉奇 谷长岭 冯迈 (222)

预告新栏目·征稿……………编辑部 (251)

解放日报改版与延安整风

杨放之

今年是伟大的延安整风四十周年。四十年前，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这一次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从延安开始，推广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全国一切党组织。如果想找出延安整风的一个范例，《解放日报》的改版，也许可以算是比较具体和生动的一个了。

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是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思想，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列主义思想。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著名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批评有些人不做调查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说他们“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还说他们是“言必称希腊”，“对中国问题无兴趣，对党的指示不重视”。这些批评对于改版前的《解放日报》，也是切中要害的。

古语说：“一叶知秋”。意思是从树上落下一片叶子，就可知道秋天来到了。我们从《解放日报》一张报纸在改版前后的巨大变化，也可看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一旦被克服，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确立，能够产生多么巨大的改造力量。

从下述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解放日报》改版前后的巨大变

化。

首先，党报和党的关系。改版以前，《解放日报》不能充分地、确切地反映党的方针和政策。例如，1941年7月的一篇社论中说：“可以庆幸的是，抗日统帅蒋介石先生，对国际的团结和国内的团结与中共中央的意见是基本上一致的。”同一时期另一篇社论说：“蒋介石先生在抗战四周年的表示，和中共中央的宣言基本精神也是大体上一致的。”好像国民党和共产党没有什么差别。有一篇社论还把“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称作“全国所拥戴的中心”，把“三民主义”和“抗战纲领”称作“抗战的经典”。这些言论都是在震动国内外的皖南事变，即蒋介石屠杀我新四军抗日将士九千余人几个月之后发表的。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印记，在这里不是很清楚吗？另一方面，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演说，号召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稍后，中央宣传部召开会议，毛泽东同志发表演说，提出要肃清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肃清党八股。这两篇传达党中央整风精神的最重要的新闻报道，竟被放在《解放日报》第三版上。由此可见，当时《解放日报》的一些工作人员，同党中央在思想上还是有差距的。至于王实味反对党、反对革命的文章《野百合花》的发表，更足以说明《解放日报》部分工作人员思想不纯，严重到什么程度。

改版以后，提出党报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应当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每写一句话、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对党负责。提出党报要和党“呼吸相通，息息相关”。改版以后，整顿三风的宣传报道，各级领导同志阐述整风运动的文章，各单位检查三风不正的新闻都明显增多，而且放在最重

要、最突出的位置。还出版了专门宣传整风运动的《学习》副刊。对于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能够表明党的独立自主的立场；对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暗中活动投降，进行恰如其分的揭露和谴责。这表明党报从残存的王明思想转到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关于社论问题的争论，也是在克服教条主义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下解决的。改版以前，《解放日报》是每天必须有一篇社论。因为每天必有，所以有好看有差。一种意见认为，一篇社论只管24小时，第二天就有另一篇社论了。还说，不论中国的《大公报》或是苏联的《真理报》，都天天有社论。在这些同志的思想里，当然最重视《真理报》。那时候凡是苏联的东西全被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报》的规矩不能改变，谁要改变它，就是离经叛道。这种意见给社论的粗制滥造开了方便之门。但是以陆定一同志为代表，却有另一种不同的意见，认为党报的社论是代表党说话的，要反映党的意见，表现党的政策观点和策略观点。它应当经得起群众实践长时间的检验，决不能只管24小时。由于写作力量的限制，不能保证每天一篇社论，可以不必天天有。但是一定要保证党报社论必须代表党说话。如果在数量和质量之间加以选择，宁可牺牲数量，打破天天有社论的老框框，也必须保证社论的质量。陆定一同志的意见，被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了。社论不是天天有了，但是社论的威信提高了，党报在群众中的影响扩大了。四十年的经验证明，这个改革是正确的，必要的。

改版以前，《解放日报》的版面安排也有浓厚的教条主义气息。第一版和第二版都登国际新闻，第三版主要登国民党军政机关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抗日根据地的新闻，陕甘宁边

区的新闻，比重就很小，而且挤在第四版的上半版，即报纸八分之一篇幅之内。第四版下半版是副刊。这也表现出抗战时期王明右倾思想倾向，即轻视我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的力量，过分重视国际的因素和国民党的力量。在国际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中，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一切取决于我党领导下人民力量不断壮大的方针，变得模糊了。改版以后，在版面的安排上，把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的新闻和文章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的事迹，成了头版头条新闻。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占了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主要位置。国际消息主要放在第三版，不像过去那样为外国通讯社充当义务宣传员了。

对于外国通讯社新闻稿的处理，也反映出对外国东西照抄照转的教条主义习气被克服的情况。改版以后，对于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要加以改写，以保证在国际事件报道中，充分显示出党的立场和观点。这也是党报增强党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关于新闻真实性问题，也是改版后注意改进的主要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而求是即求得事物的规律性，这就必须以掌握大量真实的事实为其基础。事实如果不真实，带有捕风捉影，主观臆造的成份，则害处很大。

党根据虚假的事实制定政策，必将导致错误；人民根据错误的事实采取行动，必将误入歧途。改版以前，《解放日报》曾出现过严重失实的新闻报道。某次在报道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匪军的数字时出了错，毛泽东同志提出严肃的批评，指出这是对敌斗争，一个字不能错，错一个字就是政治问题。毛泽东同志要求新闻报道学习我军报告战果的传统，讲老

实话，不多报一条枪。《解放日报》改版后发表的《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社论，对解决这个问题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西北局决定地委、县委宣传部长都要担任《解放日报》的通讯员，负责组织所管地区内的通讯员工作，并给予《解放日报》派往该地区的记者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这就从组织上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通过《解放日报》改版，可以看出延安整风精神在一个具体单位是怎样落实的。可以看出整风如果正确运用，能够产生多么巨大的改造思想、改造作风、除旧布新的作用。整风使我们获得了一个面貌全新的名符其实的党报。这个党报又成为宣传整风运动，向各抗日根据地传播延安整风经验的有力工具。延安整风统一了全党思想，准备了七大的胜利召开，引导我们走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目前我党历史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在十二大以后和1983年即将进行的整风整党开始之前，回顾延安整风中关于《解放日报》改版的这段历史，也许不无教益吧。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陆定一同志教我们写社论

黄 钢

1942年10月中旬的一天，陆定一同志叫我到他和秦博古同志办公的窑洞里去，告诉我说：“过几天，就是鲁迅去世六年了，我们要发一篇社论，纪念鲁迅先生；你去准备一下，写一篇，拿给我们看看……”说时，他和博古都望着我，面带微笑。

为《解放日报》起草一篇社论纪念鲁迅，对我当时那样一个青年记者来说，份量的确不轻；但是，我是没有理由能够拒绝这一起草任务的：因为我曾是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学生和干部，怎么能有理由对此表示迟疑呢？

“好吧，我先去写写看。”应承下来时，我也知道，以我的学力，完成这一题目，困难是不小的。象我这样从延安鲁艺文学部（文学研究室）出来的人，最大的弱点之一是几乎完全不了解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我到《解放日报》后因兼任采访科科长，每晚要审阅一些稿件：《解放日报》那些派驻在陕甘宁边区各地的记者同志们写回来的通讯和新闻稿，我对他们所报道的运盐、交公粮等等生产运动情况与边区社会生活，实际上是不懂的，仅就此一点来说，我担任采访科长，也是很不够条件的；此外，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的实际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或者还加上一般的知识（包括中国历史知识），我自己也都知之甚少。我的这些缺点主要说明了我的个人状况，同时也是同整风运动前延安学校与干部教育中“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列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

的作风”有一定关系的。现在报社领导同志嘱写纪念鲁迅先生的社论草稿，无疑是对于这些方面的又一场考试。

当时，延安的整风，已经开始从学风的整顿，转入到党风的学习过程中，我准备从“纪念鲁迅先生与整风运动”进入主题，并由此阐明当时纪念鲁迅先生的现实意义。因此，我着重强调了鲁迅一向主张要加深对实际斗争的了解的言论：“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社论草稿中也论述了鲁迅先生充分尊重历史和尊重现实的精神，重温了鲁迅先生1930年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演中早已提出的不要“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的叮咛告诫。我拟的草稿，限于自己的水平，顶多只是和当时整风运动的一般任务相联系，即联系了党的学风应反对主观主义，为党风的整顿进行宣传……我这样急切的联系实际的心愿，不能说是不对的，但是，作为中央党报来纪念伟大的鲁迅，却未免失之于单薄和浅见了。

这篇草稿给定一、博古同志后的第二天，和我同住在一间窑洞的张沛同志（当时通讯采访部人员）告诉我：“定一同志叫你去一下，你写的社论稿他已经改好了。”

于是，我再次跑到定一、博古同志共用的窑洞过道里去，从定一手里接过那篇已经被他修改得焕然一新的社论草稿——除了那些引用鲁迅言论的部分还剪贴在原稿中间以外，很多段落差不多都是定一同志大段大段改写之后的新手稿，在那上面间或还有博古同志在旁添改过的字迹。

“社论的稿子我们改了一下，”定一同志说，“你看看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看见文章的第一段只是保留了我写的开头几句的大意，具体改成了：“我们以至高的尊敬和虔诚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共产主义者，进步的文化界和抗日人民，在先生的思想和文学事业道路上找到他们光荣的先驱：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底先进战士和指挥员，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最优秀的代表。”

定一同志在开篇的提法上接着改下去：“先生的瀚浩遗著，不仅是光辉伟大的文艺典籍，而且是近几十年来中国革命斗争的纪念碑。不仅文学工作者作家可以从他那里吸取无穷的丰富的思想和创作的养料，而且每个中国人，中国革命战士，可以从先生遗著中学习无数宝贵的东西。”

看到这里，我感到惭愧：虽然我是从鲁艺文学系出来的人，但对鲁迅先生的理解却没有定一、博古同志那样的准确和深刻，更没有他们那样赋予先生以符合于实际的高度的评价。

以下，定一同志保留了我原来起草的“鲁迅先生对待文学工作的现实主义态度，在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界还保留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和教育的意义”一节（这一节主要是引用鲁迅自己的论点）之后，加进了重要的发挥——

“今年我们纪念鲁迅先生，重温先生的这些见解，弥觉珍贵和亲切。我们革命的文艺界将坚决遵循这个方向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面向工农兵大众去，这样来纪念自己的大师。”

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了五个月之后，尽管在1942年10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公开发表，定一同志在这篇社论写作的当年却是第一次地把“坚决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指示连接在一起，而且，依据毛主席在五个月前《讲话》的主要

内容，明确指明了“革命的文艺界”应“面向工农兵大众去”，以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纪念自己的大师”。

以下就是定一、博古同志更重要的发挥了。象定一同志这样的阐述，是我当年的政治阅历所不能企及的——

“然而鲁迅先生底伟大，不仅是在他是一个中国近代的最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解放底战士，中国共产党底良友与战斗的同志。鲁迅先生以锐利的笔锋，横扫一切保守落后的势力，割破黑暗，指示光明。鲁迅先生有着最明确的政治立场，最清楚的原则的战斗态度。他坚持革命的大旗，明分友敌之区别。对于阻碍革命前进的黑暗势力，他是坚持地英勇的搏斗，毫不留情，力主落水狗必须痛击，提倡‘韧性的战斗’。而对革命的队伍，对于革命的政党，则‘愿意遵奉其命令’，则‘俯首甘为孺子牛’，并且以得引为共产党的同志而自豪。对于革命队伍纵有缺点，鲁迅先生亦主张‘一面进军，一面克服’。鲁迅先生以最高的热忱和忠诚服务于新兴阶级——无产阶级，以无限的信心瞻望这个阶级的未来，并和它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直战斗到死。”

以上是定一同志修改、定稿的社论的核心部分。以下，定一同志的笔力未尽，又把他的论点加深了一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先生对托派匪徒的嫉恶和痛击。他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表示了，为了抗日，若是有一种理论名虽‘高超’，‘奈何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他痛斥托派挑拨离间的诡计。

“作为革命家的鲁迅先生底这一方面，尤其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切愿意继鲁迅先生精神和事业的人，应该首先毋违鲁迅

先生在这方面的精神。只有与先进的阶级一起，只有自愿的遵守它的‘命令’，只有与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恶劣残余，及反革命的托派活动作坚决的斗争，才配得上作为‘鲁门子弟’，才配得上作一个先进的文学家、作家。”

这一段社论主题的表达和发挥，不但对于当时延安革命文艺界和全国进步文化界，具有十分鲜明的针对性，就是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重读起来，仍然充满了现实意义。直到今天，我国革命文艺队伍，仍需要“坚持革命的大旗，明分友敌之区别”，“而对于革命的政党，则愿意遵奉其命令”，则“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都“应该首先毋违鲁迅先生在这方面的精神”，克服“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恶劣残余”。

当年《纪念鲁迅先生》的社论（定一同志把我草拟的《纪念鲁迅先生与整风》改成为这样的题名，从而明确了它那一般性的长远的意义），结尾的部分，大体上保留了我起草的词句——

“伟大的英勇的旗手离世六年，但他的事业——思想，著作和行动，象战旗一样插在我们面前。年年我们以至高的尊敬与虔诚来纪念鲁迅先生，但今年，我们在这战旗下的步伐更整齐，更有力；我们行动的收效更多，对鲁迅先生底战友和门生的义务，也尽得最好最完美。鲁迅先生的精神，在我们这里活着，没有休息，因为我们的战斗时时在进行，永远也不能休息。”

在博古、定一两同志共用的窑洞过道里，我坐在延安自制的小木凳上看完了定一同志改过的定稿（这时候经过了夜间改稿和看报纸清样劳累的定一和博古同志，在我的身旁，也是坐在两张矮木凳上，正在玩扑克牌游戏），定一同志在他同博古

同志开玩笑的笑语声中转过脸来，用他那很重的南方口音向我问道：“还有什么意见么？黄钢同志，提出来，我们可以再改！”

这时候，我真是羞愧难言，坦陈了我的感受：“我很惭愧——对鲁迅的理解，太差了！我还是一个专门学校学过文学的呢！（停一停，我又说）原来，我就知道这题目在我是很难完成的，只是我没有勇气拒绝你出的题目就是了。”

“你是没有理由拒绝的。”秦博古同志手里一面洗牌一面抬起头说。

“是呀，……”

“你知道吗？我们两人都不是学文学的：他是学工的（定一同志指着博古说），我也是学工的，我是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科的；只是革命，把我们推到这个报馆里来了！哈哈！哈哈……”说完，他们两人都放声大笑了。

“真的，学工的，学工的……”博古一面低头给他和定一同志重新分牌，一面咕噜着说，好象这不是指他们自己，而是指另外第三者的什么陈年往事。

这时候，手拿着红墨水毛笔的报社总编辑余光生同志走进窑洞，他是来取这份社论定稿的。他对我们三个人说：“没有意见，我就拿去发排了。”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定一同志是在定稿之后，特意给我留下了一点时间，再征求我的意见，实际上，则是用他们自己帮助新干部的行动，通过这样带启发性的方式在帮助我，以利于我们青年新闻工作者的成长。

第二天（1942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辟栏位置刊出了这篇《纪念鲁迅先生》社论。这一社论所经历的修改过程，始终成为我在那以后的写作生活中激励我上进的一种

精神力量：当时我就想，我将会记住定一、博古同志从事党报工作时那样地去帮助无名青年人的榜样——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在距离延安十分遥远的冀察热辽解放区的游击区创办战争中的地委小报时，我总是力图学习着定一同志所教给我的这种诚挚的方式，协助那些比我年轻的、在战争中新近加入到新闻战线的从业员，从不会到逐渐学会、逐步提高……。

在此以后的各个时期，每当年轻的采编人员，在我退给他们改稿与定稿而使他们显得腼腆和有些激动时，我总是引用陆定一同志教我写社论的往事，对他们说：“这有什么呢，延安解放日报领导人就是这样地——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写稿的，甚至稿件登出了，很显然，基本上不是我的劳动，可是，当解放日报结算那一个月稿费时，还把《纪念鲁迅先生》社论的稿费，结算在我的名下。领取这样的稿费，在当时我也同样是感到很惭愧的——虽然它的数字很微小：在延安也仅能吃半斤红枣加江米做的枣糕……”

“为什么这篇社论的稿费要发给你呢？”今天的年轻人也常常不理解，有时会这样问道。

我向他们解释：“尽管我当时坚决不肯收下这笔相当于一、两斤小米的钱，同时还向分发稿费的同志极力明辩说：‘这篇文章，只剩下很少的几句是我写的了，这是陆定一同志的劳动，基本上是他写的。’可是，那位经管稿酬的同志却对我说：‘这是定一同志已经关照过的：稿费要发给你。’”

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延安有没有极其微薄的、几乎是象征性的稿费，甚至问题也不在于定一同志这种高尚的精神风貌，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使现在的青年朋友能够理解当年延安人与人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清亮如水的关系呢？